

## 美国大学国际战略研究的几个特点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要取得进步,除了从我们当前的国际政治实践中、从古代及近现代中国的战略经验和战略讨论中汲取营养外,还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大国的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状况。在这方面,美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要更为发达,这体现在其众多的研究机构、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充足的研究经费、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健全的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而且,从其国际战略的实践来看,既有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和在冷战中拖垮苏联这样的成功之作,也有深陷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这样的深刻教训,故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部门,除了政府自身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大的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外,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自身从事国际战略研究,而且还担负着向其他研究机构输送人才的任务,其研究和教学水平自然会影响到国际战略研究的总体水平,也构成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真正基础。

国际战略研究进入美国大学,并成为大学科研和教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从一个内向型国家转而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大国,崛起于世界舞台。在新的冷战国际环境下,面对激烈的美苏全球竞争以及军事技术的大发展,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研究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遂从二战之前基本为军人所垄断的局面,逐渐转变为民间战略家(防卫知识分子)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在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中,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受教于芝加哥大学,任教于耶鲁大学;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兰德工作了12年之后又去芝加哥大学任教;谢林(Thomas Schelling)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而基辛格在进入政府之前则一直是哈佛的政治学家。

---

早在二战结束之前,厄尔(Edward Meade Earle)教授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研讨班,讨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研讨的成果后来由厄尔编辑出版,成为战略研究的一部经典。参见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现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大都建有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比较著名、并且有自身特色的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项目、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以及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安全项目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传统,选取国际战略研究中的若干方面或要素,发展各具特点的国际战略研究。此处试举几例来加以说明。

其一是重视跨学科的研究。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该中心的前身是1970年建立的军备控制与裁军项目。依托斯坦福大学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该中心成立之后发展十分迅速。其人员构成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工类科学家,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工程类科学家等;另一部分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引人关注的各种国际安全问题展开合作研究。由这种跨学科的合作而产生的国际战略研究成果,既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考量,因而更具有创新性,也更具有生命力。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现有的研究项目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扩散与恐怖主义项目,国土安全项目,预防性防御项目,以及加强南亚安全与稳定项目。每一个项目的研究人员构成都是跨学科的搭配,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实用价值。

其二是政府和大学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安全项目中便有来自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全部四个军种的访问学者,其情报分析课程也由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来担任讲师。这就使研究人员和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并关注具有实际意义的安全问题,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而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把现实政策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交给大学来研究和解决。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安全项目现在包括军民关系、常规战争、防卫技术、防卫政治、防卫产业和人道主义干涉等研究小组,从中不难看出,大学和政府部门在国际战略研究上的有效互动带来的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也更具有实用性。另外,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协作关系还表现在这些战略研究机构为人才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赖斯当年步入政策圈,多赖斯考克罗夫特的提携,而斯考克罗夫特结识赖斯的场合,正好是他去参加斯坦福“搞军控的那帮人”的一个学术活动。

其三是重视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该学院于1960年代中期成立之后,在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

或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机构。在美国学术和政策界,这几个概念大致是通用的。  
该中心原名为“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

Neustadt)、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持续努力下,发展出一种从案例研究入手来研究国际战略的路径。其中,诺伊施塔特对美英关系中一度十分棘手的“空中闪电”(Skybolt)导弹危机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梅对法国在二战中的失败、对美国对外政策中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的讨论,艾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三种决策模式的归纳,都成为“应用政治学”和“应用历史学”的成功范例。正像大学中法学院和管理学院现在普遍都十分重视案例研究和教学一样,作为具有相当实用性的一门政策科学,国际战略研究的品质也可以通过案例研究而得到提升。当时,兰德公司以博弈论和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国际战略研究模式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哈佛大学的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另辟蹊径,在前者研究的盲点中开掘出自己的一片研究空间,而且这种研究路径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其四是通过历史研究来考虑国家的大战略问题。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耶鲁大学以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肯尼迪关于英德海军竞争、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加迪斯关于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研究,都已成为这些研究领域中的经典。

其五是重视国际战略研究中的军事要素。以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为核心的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从1997年开始,已经连续11年举办“军事行动与战略”的暑期讲习班。该讲习班的研修内容基本上都属于军事领域,如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战略战术的评估方法、国防预算、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等。该研究所还有“国际安全政策”、“战争、和平与战略”等课程。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开设有类似的课程。这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在其所涉及的军事领域内,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

以上主要侧重从积极的方面来介绍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特点。其实,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战略研究者讨论美国整体国际战略研究的缺陷时均有所提及,比如:对历史重视还不够;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重视不够;美国例外论,培育了一种危险的、傲慢的战略文化;过于机械,总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躲避战略和政策上的难题,导致战略研究的“非政治化”,如威慑、有限战争和军备控制是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柱,美国学术界包括各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很少有人去确认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产生危机和战争的政治原因,等等。现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负责伊拉克事务的许多官员不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别,偌大的美国军队难觅几个阿拉伯语的人才等,均折射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缺陷。

---

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载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页。

与美国大学国际战略的研究情况相比,中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和教学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由于过于讲求技术手段而显得“太硬”,那么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则由于过于宏观、过于讲求规范和文化而显得“太软”。大而化之的东西多了,所提出的战略便很难落实,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评估。另外,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我们政府部门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够密切,军方和民间的研究则基本上是脱节的,其结果便是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多属纸上谈兵,而实际政策部门则是疲于应付;懂军事的文人战略家少,深入了解国际政治的军人也少。再者,在我们的国际战略研究中,跨学科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尤其是科学技术在国际战略研究中的应用,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从战略管理和战略研究体制改革入手,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体制,努力开展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在现阶段可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